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新政真詮

何启
胡礼垣集

郑大华 点校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德	大同书
秋赋	仁学
保西学议	建国方略
保西纪程	经世危言
保国文集外编	
海国图志	煌书
盛世危言	新保论
论世变之亟	经国头
新政真詮	睡的人醒了
强学一戊戌时论选	
民声一辛亥时论选	
新潮一民初时论选	



国防大学 2 061 4654 3

·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

新政真诠

——何启 胡礼垣集

郑大华 点校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沈阳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真詮: 何启、胡礼垣集/郑大华点校.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52-3

I. 新…

II. 郑…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③何启-文集④胡礼垣-文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20,000 印张: 16 $\frac{7}{8}$ 插页: 5

印数: 1-1,583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华玉洪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孙东岩

刘再升

定价: 17.6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何启(1858—1914年),字沃生,广东南海人。1872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入帕尔玛学校,阿伯丁大学和林肯法律学院学习。1882年回国后在香港任律师和医生,是香港议政局议员。1887年创办雅丽氏医院,医院附设有西医书院。孙中山曾在该书院读过书。1895年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即乙未广州之役,他积极参与,并负责起草对外宣言。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在香港总督卜力(N. A. Blake)的授意下,草拟《平治章程》,建议孙中山的“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1900年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3年将所办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

胡礼垣(1847—1916年),字翼南,广东三水人,买办商人家庭出身,何启早年在香港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读书时的同学。长期居住香港,办粤报,著有《胡翼南全集》。

何启、胡礼垣的生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们合著的《新政真诠》一书则是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他们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中国早期维新派

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的声誉。

《新政真诠》由“初编：曾论书后”，“二编：新政论议”，“三编：新政始基”，“四编：康说书后和新政安行”，“五编：劝学篇书后”，“六编：新政变通”以及“前总序”、“后总序”组成，实际上是写于不同时期的9篇文章汇编。这些文章大都先由何启用英文写成，然后由胡礼垣译成中文，并“阐发之”。虽然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彼此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都是围绕中国要不要改革（即实行新政），以及如何改革这一问题而展开议论的，当然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首先写成的是《曾论书后》（原名叫《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此文写于1887年夏。先是这年的2月8日，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文举中国购战舰、筑炮台、保藩邻、防外侮等所谓“外攘夷狄”者为据，认为中国“昔睡而今醒”，但于任贤能，黜浮伪，核名实，洽君民等所谓“内修政治”者则略而不详。何启阅读此文后，认为它“本末舛逆，先后混淆”，因此“实恐虚文粉饰，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于是写《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一文“以辩之”，就中国弊政大端以及亟宜改革事项等问题向曾文提出质疑。指出：科甲选士，不能造就人才；俸粮扣克，不能鼓励武弁；炮台虚设，不能卫我岩疆；铁舰徒矜，不能固吾海宇；讼狱不察，不能约束洋人；内政不修，不能保护藩服；虚文礼谊，不能扶救颠危；轻试其锋，不能坐成

干济；民不信任，不能底绩大功；国失权衡，不能守持自主。因此，与其说中国已醒，还不如说中国仍在昏睡之中。而要使中国从昏睡中醒来，其关键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更张丕变，咸与维新”。否则，“当今之世，而不变今之法，虽使尧舜临朝，禹皋佐绩，仲由慎诺，公绰无私，加以管晏之才，苏张之辩，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文中就君民关系作了新的说明，认为有民才有国，有国才有君，“苟无民，何有君？”君的职责在于“保民”、“利民”，使民能“立国”、“兴国”。

《新政论议》(原名《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写于1894年冬，刊于1895年春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前夕。其时，中日战争已近尾声，中国战败已成定局，割地赔款在所难免。面对如此险恶处境，中国如何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噩运，并进而重新振作起来，这是每一个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的问题。何启、胡礼垣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兹当玉弩惊张之会，金瓯动荡之辰，将欲再奠元黄，永安社稷，则必奋然改革，政令从新。”于是他们写下《新政论议》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变革主张。在他们看来，要“奋然改革，政令从新”，就“宜复古帝王执中精一之心传，而行古帝王因时制宜之运量。”具体而言，“复古者其要有七”：一曰择百揆以协同寅；二曰厚官禄以消贿赂；三曰废捐纳以重名器；四曰宏学校以育真才；五曰昌文学以救多士；六曰行选举以同好恶；七曰开议院以布公平。“因时之事其要有九”：一曰开铁路以振百为；二曰广轮船以兴商务；三曰

作庶务以阜民财；四曰册户口以严捕逮；五曰分职守以厘庶绩；六曰作陆兵以保疆土；七曰复水师以护商民；八曰理国课以裕度支；九曰宏日报以广言路。

在《曾论书后》的基础上，《新政论议》对君民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文中写道：“横览天下，自古至今，治国者维有君主、民主，以及君民共主而已。质而言之，虽君主仍是民主，何则？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藉君以护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业方能护，则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其法令之不能行也。于是乎奉一人以为之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根据对君民关系的新认识，《新政论议》第一次提出了“行选举”、“设议院”的主张，并且相信，“若是者国有万年之民，则君保万年之位，所以得民莫善于此。”

《新政始基》作于1898年春。其时，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正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对于变法维新运动，何启、胡礼垣是支持的，但由于他们人在香港，加上在一些问题上与康、梁等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其具体活动，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变法理论的阐发上。他们警告清政府，自甲午战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鹰瞵虎视之国，莫不竞存鲸吞蚕食之心，观衅而乘，环伺而起”，如果清政府仍然因循守旧、拒不变法，“恐灾害百出，

诚非关心国计者所忍言也。”而变法的内容，在何启、胡礼垣看来，除改革官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院等项之外，“中国理财之法”“不可不变，且不能不变”。《新政始基》重点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谓官商各有专司之事，混而为同则扞格；开物宜存奖励之意，抽其公款则心离；出口之税不可加，加之则商愈困；地丁之抽不可益，益之则民愈贫；昭信股票不可行，行之则官愈坏；减俸裁馆不可议，议之则兵愈孱，地丁盐课宜以印度之国赋为比，否则，应收一万万五千万两者，所得不过四千四百万元也；土药厘税宜以局外之稽查为断，否则，应收一千八百余万两者，所得不过二百二十余万两也。地关进项宜以洋关之收缴为准，否则，应收一千万两者，所得不过一百万两也；地方公务宜以本处所征餉项为之，否则，止有君事，绝无民事，止有君需，并无民需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始基》中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且指出，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必须改变原来那种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去掉“官督”，允许商民自办企业；其次保护关税，以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第三把厘金合并于关税，以减轻厘金对工商业的危害。

《康说书后》成书仅比《新政始基》晚两个月。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保国会以救亡图存相号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何启、胡礼垣认为，康有为倡设保国会，“欲激昂事理，捭揅谈风，

以牖万民之心，而广士夫之智，其志足嘉也。”但康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似未能握要，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于是他们“急为书后一篇，以质诸康君，并以质诸斯时之欲为中国变法者。”

何启、胡礼垣在《康说书后》中对康有为在其演说中谓泰西之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义相运之故，中国之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义不合之故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夫事也、物也、理也，固有为古之所有今之所无者，亦有为古之所无今之所有者，执今之有无，以定古之有无不可也，执古之有无以定今之有无亦不可也。”因为“今古不同，源流顿异。”实际上泰西之所以能保民、养民、教民，不在于“以其所为与吾经义相运”，相反在于“无经义以阻挠之”；中国之所以不能保民、养民、教民，亦不在于“以其所为与吾经义不合”，相反是由于“有经义以蔽塞之也。”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西人所读之书，阅数年而一变；华人所肆之业，历千载而不更。西人新法之善，必竟委而穷源；华人古法之拙，犹多方而护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西人比华人聪明，而是中国的科名害了中国人。“是故八股经义之法不改，则学问必无进境之机，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则中国必无振兴之望。”八股经义同为导致中国人虚骄保守的“病根”，二者都应废除，而不可像康有为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废除八股，“乃复以经义而取才”。如果那样的话，“是八股犹未废也。”何启、胡礼垣还对“中体西用”论提出了批评，他们

写道：“今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经济，西学为富强，皆于其理有未明也。”在他们看来，西学既有其体，也有其用，其体是它的民主政治，其用是它的实学。《康说书后》指出：“泰西之为国也，朝廷政令可否，皆决于议院，而议员则来自民间；草野讼狱曲直，皆判于陪审，而陪员则选诸民庶。上有清明之法度，下有平恕之民情，而富强之体已传。若夫学问之繁，撮其要则为天学、地学、人学；学问之施，施于事则为神科、医科、律科；其余工艺之流，支分派别，心计之巧，月盛日新，学无不成，人无不学，而富强之用亦全。”

《康说书后》写成不到两个月，戊戌政变突然发生，“六君子”被杀，其他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放逐。政变后，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全部被取消，变法运动宣告失败。何启、胡礼垣没有被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所吓倒，仍在继续变法理论的创作和宣传工作，就在戊戌政变后不到三个月，他们刊行了《新政安行》这又一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在其“序”中针对封建顽固派对变法维新运动的攻击，他们理直气壮地公开宣称，“新政者所以救中国之药也。”他们在文中还谴责了封建顽固派屠杀、迫害维新志士的行径，指出，顽固派以维新派“植党营私”为借口而大兴党禁，大开杀戒，实际上“植党者，其党未必以杀人为心也；营私者，所营未必以杀人为事也；使其党于善耶，是社稷之臣也，引而进之可也。”退一步说，“维

新之徒纵曰植党营私矣，守旧之辈亦何尝非植党营私哉？且新党未尝以杀人为事，旧党先以杀人为功，是党祸之开开自旧党也。”公开为维新派辩护，谴责顽固派的屠杀，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

继《康说书后》，《新政安行》对“中体西用”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批判。文中指出，“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末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名为体，用名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则其用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故此，西学有其本，也有其末，有其体，也有其用。西方的富强不仅仅像洋务派所说的那样只有“末”或“用”，而且也有其“本”和“体”，“无富强之本，则纵使其学极高，亦不能为富强；无富强之体，则纵使其才极美，亦不能得富强也。”正因为洋务派固执于“中体西用”论，没能弄清本与末，体与用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以求富求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何启、胡礼垣是从理论上批判“中体西用”论的第一人，人们常引用的严复以牛体马用为喻对“中体西用”论的批判，那是在1900年以后，晚何启、胡礼垣的批判好几年。

《新政安行》还进一步论述了“兴民权”的重要性，指出：“树必有干，然后枝叶生；邑必有市，然后货物集；名理必有其会通，然后无矛盾，无出入，无崎岖邪曲，无错乱纠纷。民权者，树之干也，邑之市也，名理之会通也。天下有无君之国，不闻有无民之国，民权在则其国在，民权亡则其国亡。”故此，何启、胡礼垣强烈要求“兴民权”。他们警告清统治者说，时局至此，列强瓜分迫在眉睫，如果仍然禁忌民权如故，则“中国之颓”将无可救药。他们也反对戊戌政变后对民间报纸的查禁，在文中他们写道：“泰西文治之法，最盛莫如日报，有一城百数十家、一家数十万纸者。思虑辟，闻见周，上德宣，下情达，无以过此。……本无可禁者也，然而禁之者则以为毁谤时政，摇动人心，类讪上之下流，比横议之处士，而不知其大谬不然也。”

《劝学篇书后》刊于1899年春。先是前一年的5月，洋务派后期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一本名叫《劝学篇》的小册子，以反对当时正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劝学篇》全书分为内外篇，内篇九篇，是“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十五篇，是“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是指封建纲常名教，他认为这是不能改变的，主张用封建纲常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束缚。所谓“通”，是指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他认为这是镇压人民和维护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东西，可以逐渐变通举办。全书的宗旨，在于反对维新派提出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

宪的主张，重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劝学篇》出版后，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维新派的批判。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是批判《劝学篇》的代表作。

《〈劝学篇〉书后》对《劝学篇》进行了全面批判，但重点主要是批判《劝学篇》的“内篇”，内篇9篇之中重点批判的又是“明纲篇”和“正权篇”，也即张之洞所宣扬、鼓吹的忠君思想，纲常名教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兴民权”、“设议院”的谬论。

《〈劝学篇〉书后》指出：“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商纣无道者也，而必不能令武王为无道，是君不得为臣纲也；瞽瞍顽嚚者也，而必不能令虞舜为顽嚚，是父不得为子纲也；文王以妣氏而兴，周幽以褒女而灭，是夫亦不得为妻纲也。”在何启、胡礼垣看来，自秦而后，三纲之说始才出现，它出于《礼纬》，而《白虎通》引之，董仲舒释之，马融集之，朱熹述之，于是流毒遍天下，其实质是谓君臣父子夫妇“有强弱轻重之不同”，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推而衍之，“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不仅如此，“勇威怯，众暴寡，贵陵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既然三纲之说是“大道之颓，世风之坏”的根源，为什么张之洞等人还“沾沾自喜以中国三纲为宝”，在那里极力宣传、鼓吹呢？何启、胡礼垣分析说，原因就在于“知君臣之纲，则

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张之洞等人所看重并以之为宝的正是三纲之说的这种社会功能。何启、胡礼垣对三纲之说实质的批判和张之洞等人之所以宣传、鼓吹三纲之说的原因分析，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相当深刻的。

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一节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民权思想，批判了张之洞反对“兴民权”、“设议院”的种种谬说。他们首先指出：“权乃天之所为，非人之所立也。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此性命之权；天既备人以百物，则必与以保其身家之权。是故有以至正至中而行其大经大法者，民则众志成城以为之卫；有不以至正至中而失其大经大法者，民则众怒莫压而为之摧。此非民之善恶不同也，民盖自顾性命，自保身家，以无负上天所托之权，然后为是已。”接着，他们依据这种“天赋人权”理论，重新解释了君权的起源，权本属于天，然天不自为，以其权付之于民，“天下之权，惟民是主”；然而民亦不自为，选立君上以行其权，是谓长民。乡选于村，邑选于乡，郡选于邑，国选于君，天下选于国，是谓天子。天子虽然去庶民较远，但其权则得之于庶民。君既由民选，君权得之于民，如果他不称职，不能代民操其权，民则有权废黜其君，收回赋于他的权力。他们并且指出：“尧舜三代之隆，莫不由此。泰西富强之本，亦莫不由此。”

何启、胡礼垣在文中写道，民权之说，中国虽古已有